

之字纹是中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代表性的纹饰系统
将系统论的思维引入对纹饰的研究
走进之字纹纹饰研究的微观世界
窥探宏观世界中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洞察史前时期世界格局的趋势及变迁

中国东北及华北地区 之字纹研究

王闯 著

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东北及华北地区 之字纹研究

王 强 著

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东北及华北 地区之字纹研究

王 闯 著

©王闯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之字纹研究 / 王闯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05-07894-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古代陶瓷-纹样-研究-东北地区 ②古代陶瓷-纹样-研究-华北地区 IV. ①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2975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 鞍山市天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3

字 数: 180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1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 喃

装帧设计: 杨 勇

责任校对: 吴艳杰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7894-2

定 价: 26.00元

编 委 会

主 任

杨路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红君 尹伟达 田立坤

张 洪 李 红 陈 涛

金 虎 贺 伟 高永民

总 序

杨路平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瞻远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谋划部署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推动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需要加大对社会科学工作的支持力度，需要鼓励潜心研究、扎实做学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需要积极营造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为实现这一目标，2012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首次资助出版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科学普及价值的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管理、文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又有研究时代楷模郭明义的著作；既有涉猎文化强省建设问题，又有涉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既有历史学，又有文学、考古学、美学；既有新闻学，又有教育学。这些著作体现了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不断探索的求实精神。这次呈现给大家的这些优秀作品，对于繁荣学术、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宣传和推介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研究辽宁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鼓励专家学者服务社会，不断提高辽宁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辽宁省社科联资助出版优秀社会科学专著工作，会进一步激发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会进一步引导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加强辽宁全面振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后会有一大批全面阐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优秀成果面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2013年8月

前 言

之字纹是一个跨区域、跨文化、跨时代的大问题，但就之字纹本身来说却属于微观的研究范畴，对它的研究不仅关系到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古代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更涉及上述地区，特别是古文化上的辽西地区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问题。因此，对之字纹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其重要意义与价值可想而知。

之字纹是指在陶器外表面施以连续“之”字形的阴纹纹饰图案。针对纹饰系统的分类方式，本书提出分层解剖、以母题为名的命名原则。因此，就其定义而言，之字纹实际上是以纹饰的母题和样式命名的一种分类。

它主要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乃至更为广大范围的文化遗存当中。其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在母题形式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同时又在具体样式上展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本书所说的之字纹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之字纹本身特征和之字纹陶器施纹风格。针对之字纹本身特征，可分解为三个层次，即线条、母题和样式。而这三个层次又各有具体的表现，其中主要对线条虚实、施纹方法、节段直弧以及纹带走向等四个要素进行考察，同时辅以实验手段，对施纹工具刃部特点进行推知。针对之字纹陶器施纹风格，首先，本书关注的是之字纹施于何种器物，而非器形变化上的具体差别；其次，主要以平底筒形罐为例（因其与之字纹关系最为密切），辅以其他器类，将之字纹的施纹风格大体归结为六大类十五种基本型。

根据之字纹典型遗址分布的集中程度，粗略地把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之字纹遗存划分为A—F六个区，对所涉及十数种考古学文化中之字纹特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结合其他调查材料，对不同文化、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区域不同阶段

之字纹特征的差别与联系进行了比较研究，最终得出之字纹特征上存在着两个大区、两大阶段以及两个现象等直观性的认识。以此为基础，本书又对之字纹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传播等情况做了综合分析，提出了“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之字纹筒形罐传统”的看法。同时，以之字纹的研究为线索和铺垫，上升为对包含之字纹的遗存文化现象的考察，并试图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内在原因进行揭示，概括出了诸如“边缘式裂变”等具体的理论观点。

最后，以中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之字纹遗存的研究为内核，再兼顾和延及国内、国外其他地区考古遗存材料，提出“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之字纹遗存月牙形分布带”的设想。中国东北及华北正好处于这个月牙的中间部分（亦即核心地带），而辽西地区又是这个核心地带的中心。月牙的南翼沿着我国东南沿海或近海地区一直弯向西南内陆，北翼经黑龙江流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西伯利亚腹地。

本书的选题和写作得到我的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杨楠教授的悉心指导，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七易其稿后最终敲定，其间的汗水、辛苦、努力以及付出可想而知，在此，对杨楠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辽宁大学张星德教授以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辛岩研究员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希望能以此书的出版来回报我的师长，也希望与学术界同仁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学习。

王 闯

目 录

总序	001
前言	001
导论	001
第一章 之字纹内涵及相关概念	010
第一节 之字纹内涵解析	010
第二节 相关概念诠释	014
第二章 之字纹的分区及特征分析	018
第一节 之字纹的分区	018
第二节 辽西地区之字纹特征	024
第三节 燕山南北地区之字纹特征	060
第四节 豫中、冀南地区之字纹特征	076
第五节 下辽河流域之字纹特征	083
第六节 辽东半岛东南沿海地区之字纹特征	088
第七节 第二松花江流域之字纹特征	094
第三章 之字纹特征分区比较研究	103
第一节 之字纹起讫年代	103
第二节 之字纹本身特征比较	105
第三节 之字纹陶器施纹风格比较	110
第四章 以辽西地区为中心的之字纹遗存月牙形分布带	121
第一节 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之字纹筒形罐传统	121
第二节 其他地区之字纹遗存	133

第三节 之字纹遗存月牙形分布带..... 144

结语..... 149

附录..... 151

 一、研究理论与方法试析..... 151

 二、实验：之字纹模拟制作..... 159

 三、图录..... 163

 四、全国各省市之字纹遗址点分布数量统计..... 174

 五、之字纹遗址点分布..... 176

 六、相关遗存碳十四测年数据..... 189

后记..... 198

导 论

所谓之字纹，是指在陶器外表面施以连续“之”字形的阴纹纹饰图案。它主要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乃至更为广大范围的文化遗存当中。

一、研究的意义

对之字纹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意义在于：

第一，之字纹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之字纹本身特征（线条、母题、样式）以及之字纹陶器施纹风格。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考察、系统的梳理和审慎的归纳，可以深化对之字纹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传播等情况的认识。

第二，纹饰是考古学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文化内涵离不开对纹饰的研究。之字纹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展现了相当的一致性，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可以深化对包含之字纹的文化遗存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第三，目前对纹饰系统分类研究尚不完善，实际使用中纹饰称呼和定名标准不统一，内涵上广泛存在着交叉现象。究竟对纹饰如何分类和怎样研究，还需要开辟新的视角和扩展新的思维。本书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可以深化对纹饰研究理论的认识。

二、研究的背景

(一) 前人研究的概况

1. 之字纹名称的来历及分类

上世纪20年代,安特生发掘锦西沙锅屯洞穴时见到这种纹饰,他称之为“波形印纹”¹。

1935年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发掘赤峰红山后,称其为“弧线纹”,并根据纹带走向的不同,分为“横弧线纹”和“纵弧线纹”²。1949年安志敏将其归为“篦纹系统的弧线纹”³。一些学者在名称前面加上一定的前缀来表示具体的差别,如“连点弧线纹”⁴、“连续折弧线纹”⁵、“编织弧线纹”⁶等。还有一些考古文献中直接将之字纹称为“篦纹”、“篦印纹”及“篦点纹”等⁷。1979年安氏又撰文建议根据其特征,一类呈弧线,一类呈弧线篦点,可分别称为“弧线纹”和“弧线篦点纹”以资区别⁸。可是,也有的学者注意到之字纹不都是弧线的,也有直线形的⁹。实际上,这些都反映出在对之字纹的分类中已经考虑到了纹带走向、线条虚实以及节段直弧¹⁰等方面的因素。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了“‘之’字形弧线纹”¹¹的称呼,但关键词仍是弧线纹,并未直呼为之字纹。70年代开始出现“‘之’字纹”的名称¹²,并逐

1.[瑞典]安特生:《奉天锦西县沙锅屯石穴遗址》(古生物志 丁种第一号第一册),袁复礼译,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第1—84页。

2.[日]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 甲种第六册),东京:东亚考古学会,昭和十三年(1938年)。

3.安志敏:《沙锅屯洞穴层位之研究》,载安志敏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54—162页。(原载《燕京学报》1949年第36期)

4.吕遵谔:《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5.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省海阳、莱阳、莱西、黄县原始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3期。

6.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7.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尹达著:《中国新石器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43—146页;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新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等。

8.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79年第4期。

9.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9年第3期。

10.相关概念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12.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刘观民、徐光冀:《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72—79页。

渐地被中国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可。1987年,陈国庆将之字纹分成六类,突出了施纹方法对之字纹形态的影响,分为:“压印弧线‘之’字纹”、“压印直线‘之’字纹”、“压印弧线篦点‘之’字纹”、“压印直线篦点‘之’字纹”、“压划弧线‘之’字纹”和“压划直线‘之’字纹”¹,但没涉及纹带走向的区别。另外,其他学者也提出过一些分类方案,如刘振华根据之字纹线条的虚实和节段的直弧分为四类,分别是:“弦线之字纹”、“弦点之字纹”、“弧线之字纹”及“弧点之字纹”²。还有的根据压印时支点的位置、纹带间距以及端头形状等方面因素进行区分³。

此外,俄国学者称之为“‘Z’形纹”⁴,韩国学者一般将其归入“栉目纹”或“梳齿纹”⁵等。

2. 之字纹与篦纹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始,在之字纹与篦纹的关系上就一直存在着分歧。一部分学者依然坚持之字纹应该归属于篦纹陶系统,如孙力“我们讲的篦纹,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泛称,它的范围包括了直线之字纹,弧线连续之字纹,压印编织纹,栉目纹和列点纹等等”⁶;同样,安志敏认为兴隆洼文化陶器“表面饰以刻划压印的交叉纹、网格纹、之字形纹和坑点纹等,原则上都属于篦纹陶的系统”⁷。但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此提出质疑,如陈国庆、于建华等认为篦纹不能包含之字纹的全部,至少那些非篦状工具压印和刻划的实线之字纹不能归入篦纹陶系统⁸;于崇源通过对新乐文化陶器施纹方法的研究将纹饰分为四类:压印连弧纹(之字纹)、弦纹、针刺抹压纹和方点连线纹,并指出“迄今在新乐的陶器中是很难找到陶器是用篦齿状工具制成的”⁹。

1. 陈国庆:《“之”字纹研究》,《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2. 刘振华:《红山文化陶器的彩纹和之字纹》,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 198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3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救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64—169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朝阳小东山新石器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 2003》,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2—74页。

4. 林树山编译:《苏联对远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研究》,《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85年第4期。

5. [韩]韩永熙:《朝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地域性》,王培新译,《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韩]姜寅虎:《兴隆洼文化之字纹筒形陶罐分析》,载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19—520页。

6. 孙力:《关于篦纹陶的几点想法》,载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编:《新乐遗址学术讨论会文集》,沈阳: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1983年,第51页。

7. 安志敏:《略论中国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载河北省考古学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编:《磁山文化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8. 陈国庆:《“之”字纹研究》,《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于建华:《早期篦纹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9. 于崇源:《新乐下层陶器施纹方法的研究》,载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 1981》(内部资料),1982年,第60页。

3. 之字纹与细石器文化的关系

“中国细石器文化”的概念由裴文中于20世纪40年代末首先提出，因遗存中包含有大量细小的石器而得名¹，安志敏曾写过专文对其进行论述²。由于受考古材料所限，所见之字纹（当时归入篦纹系统）又经常与细石器共出，因此，学者自然会把之字纹与“细石器文化”联系到一起，将其归入细石器文化范畴³，这种认识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伴随着考古材料的逐渐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红山文化⁴、富河文化⁵、新乐下层文化⁶、新开流文化⁷、左家山一、二、三期文化⁸等一系列包含有细石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相继从统称的“细石器文化”中区分出来，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所谓“细石器文化”实际上不是一个单一文化，它延续时间很长，主要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上限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更晚，包含了不同特征、内涵、文化面貌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因此，用“细石器文化”来笼统地称呼，或在其下划分类型，都无法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即不同族系的历史和相互关系⁹。于建华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之字纹与细石器没有必然联系，有细石器的遗存不一定共出之字纹，同样有之字纹的遗存也不见得一定存在细石器¹⁰。

4. 之字纹施纹工具与施纹方法

一般认为之字纹的施纹工具从质地上分可能有石、陶、骨、蚌和竹、木质等，但除石器之外大都不易保存。目前已知出土并推断为施纹工具的有富河沟门遗址1件带齿骨器¹¹，满德图遗址3种7件小石器工具¹²。新乐遗址之字纹的施纹工具被估计为“一种带弧度的骨片”¹³，裴李岗文化的之字纹可能是用齿刃石镰等

1. 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载裴文中著：《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135—142页。（原载《燕京学报》1947年第32期）早在1906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热河省进行调查时采集有部分细石器，他将其称为“蒙古式石铤”，引起了对细石器文化的讨论。之后，水野清一、江上波夫提出了“蒙古细石器文化”的概念。（参见鸟居龙藏：《蒙古旅行》；水野清一、江上波夫：《蒙古细石器文化》；水野清一：《满蒙新石器时代要论》，转引自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2. 安志敏：《细石器文化》，《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六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36—40页。

4. 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尹达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6—148页。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6.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8. 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9. 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杨虎、谭英杰、张泰湘：《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0—96页。

10. 于建华：《早期篦纹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12. 刘振华：《内蒙古奈曼旗满德图遗址》，《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增刊。

13.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带密齿状工具施加的¹。此外,在俄罗斯的阿穆尔河(俄文Амур,音译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下游苏丘遗址还发现数件陶制圆盘状施纹工具,可能用于滚压²。

之字纹通常被认为是用单体的片状工具以两端为支点交替运行的过程中形成的³。刘振华称为“轮侧斜出压印法”或“摆具移压法”,具体又分“侧压法”和“扭压法”两种,前者是施纹工具垂直下压,后者是在压印过程中有一个扭曲的动作。他根据身与刃形状的差别将施纹工具分为A、B、C、D、E五类,分别为铲刀状、短舌状、筒瓦状、蚌壳状和削竹状(笔者按:A类平直刃,B类凸刃,C、D、E类大体为曲刃)。其中A、B两类通过垂直下压,可得到直线之字纹,C、D、E得到的是弧线之字纹,而A、B通过在压印中稍微扭曲的方法,还可以得到略带弧度的弧线之字纹。至于点线之字纹,他认为只是在施纹工具的刃部打出缺口所致⁴。《敖汉赵宝沟发掘报告》的编写者将之字纹施纹工具按照刃部特征分为五类,分别是直面刃(平直刃)、曲面刃(凸弧刃)、直面篦齿刃、曲面篦齿刃以及筒瓦状刃(曲刃),认为直面刃、曲面刃压出的是直线之字纹,筒瓦状工具能够压出弧线之字纹,而直面篦齿刃、曲面篦齿刃对应点线直线之字纹⁵。王卫民则通过力矩原理解释为何直刃工具压印出来的往往是两端深中间浅,而凸弧刃工具压印的则线条深浅一致的现象⁶。陈国庆认为除了压印之外,还存在压划之字纹,但他所谓压划实际上是刻划,是利用尖状工具刻划而成⁷。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滨海地区有一种使用圆盘状带齿工具滚压所形成的之字纹⁸。

5. 之字纹的来龙去脉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关于之字纹产生的推测

观点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1. 杨肇清:《试析锯齿石镰》,《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赵朝洪:《谈磁山文化的几个问题》,载河北省考古学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编:《磁山文化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46页。

2. [俄]B.E.麦德维杰夫著:《黑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施纹工具》,宋玉彬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5年第1期。

3. 于崇源:《新乐下层陶器施纹方法的研究》,载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内部资料),1982年,第60—61页。

4. 刘振华:《红山文化陶器的彩纹和之字纹》,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37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64—169页。

6. 王卫民:《小议“之”字纹及其施纹工具》,《长春文物》第7期。

7. 陈国庆:《“之”字纹研究》,《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8.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9—210页。

第一类观点，认为之字纹起源于其他的纹样，如交叉纹¹、网格纹²及横排平行短斜线纹、人字纹等³。

第二类观点，认为之字纹起源于其他事物或现象，如信仰和崇尚物⁴、对闪电的认识⁵、反复运动过程留下的痕迹⁶以及仿编织物⁷等。

(2) 关于之字纹的文化起源与传播

第一类观点，认为之字纹起源于冀南、豫中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如严文明认为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中连续折弧线篦纹（之字纹）来源于磁山文化⁸；赵世纲认为是裴李岗文化先民最先创造了包含之字纹在内的篦纹，然后大致分成南北两条路线向其他地区传播出去⁹；然而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与红山文化中可能有渊源关系的是点线之字纹，而实线之字纹大概是从兴隆洼文化中继承下来的¹⁰。

第二类观点，认为之字纹起源于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系统。如王素清认为“中原的篦点纹是直线形式，与东北地区有显著差别；而在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中也有一定数量篦点之字纹和发达的压印线形之字纹，时代亦相当早，证明这类纹饰的发端，仍应在东北地区探索”¹¹；梅鹏云、郑绍宗、闫亚林等主张之字纹是北方文化系统的代表，它的因素影响到了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和豫中地区的裴李岗文化¹²；周阳生通过对新乐陶器的研究认为新乐文化之字纹承袭了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存而来¹³；高青山认为辽东半岛东南沿海地区所出现的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朱廷平：《辽中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刍议》，《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1期；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等。

2. 索秀芬、郭治中：《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一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100页。

3. 刘国祥：《兴隆洼文化与富河文化比较研究》，《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4. 靖伟德、王临、王松林：《解读新石器早期陶器上的之字纹内涵》，《北方民族》2005年第3期；都兴智：《关于之字纹陶器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5. 傅期云：《陶器“之”字纹与东北亚文明史》，《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1期。

6. 刘振华：《红山文化陶器的彩纹和之字纹》，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37页。

7. 许玉林：《试论辽宁之之字纹陶器》，载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编：《新乐遗址学术讨论会文集》，沈阳：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1983年，第46—50页。

8. 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第1期。

9. 赵世纲：《篦纹的起源与传播》，《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10. 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光——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79年第4期；赵朝洪：《谈磁山文化的几个问题》，载河北省考古学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编：《磁山文化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46页。

11. 王素清：《内蒙古东部区含之字纹诸考古学文化综述》，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12. 梅鹏云：《磁山文化再观察》，《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郑绍宗：《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闫亚林：《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文化格局的变迁与筒形罐系统的文化趋势》，《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

13. 周阳生：《新乐文化源流及其相关问题》，载武振凯主编：《新乐文化论文集》，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2000年，第170—180页。